

## 大陸問題研究新途徑 ——「多重規定論」運用之初探

汪 毓 瑋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

### 摘 要

若欲正確認識中國大陸問題，須從其怎樣看待歷史之世界觀及其如何認識世界之方法論，去加以掌握，而不是僅單純經由表象的「狀況」作出想當然的論證。換言之，研究大陸問題應回歸深層事態之本質，考量其理論脈絡及固有歷史場景；而不宜一味地套用西方概念、模型。本文試圖透過知識論角度，經由社會主義框架下「多重規定論」內涵及運用原則之建構，逐步開拓出一條有別於「資本主義」思想背景之另一個研究途徑，並盼能藉此喚起有意願研究大陸問題之學者能群策群力、不斷修正促其更臻完善。

**關鍵詞：**典範、多重規定論、文本、症候解讀法、總體性

### 壹、前言

五十至七十年代，西方學者在學術「理論」上對中國大陸之研究可概分為「革命」與「現代化」兩大典範。<sup>1</sup>若再予以細緻化分類，則有四個階段之變革：從中共建政至文革前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

---

1.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Richard W. Wilson

nism) 模式，或則稱「古典制度主義」(classical institutionalism) 模式；<sup>2</sup> 從文革至毛澤東過世之「多元主義」(pluralism) 模式；<sup>3</sup> 從 1978 年改革開放至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模式<sup>4</sup> 以及從結構主義過渡到「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 模式。<sup>5</sup> 各階段變革所反映之深層問題，不在於表象上之不同內容或研究重點，而是本質上應如何從「知識論」的角度<sup>6</sup> 去辯證看待大陸問題之深層意涵及其發展。

從實務之「實踐」(praxis) 上，1989 年蘇聯、東歐共產國家的大變局，促使西方學者重新思考以往政治學界所慣用極權政體 (totali-

---

eds.,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New York: Praeger, 1983), pp.27-30; 李英明, 《中國大陸學》(臺北: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5 年)、《中共研究方法論》(臺北: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2. Tai-Chun Kuo &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6), p.17.

3. 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Norton & Company, 1981)。

4.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22-27; 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5.

5. 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3), pp.121-122.

6. 汪毓璋, 〈中山先生方法論之初探—知識論、方法論之研究途徑〉, 《全國三民主義(中山學術)研究所(組)第六屆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4 年 4 月 8 日, 頁 134-138。

tarian regime) 和官僚政體 (bureaucratic)，去分析列寧體制國家發展之理論有其局限性。諸如以極權政體理論分析列寧體制國家將呈現出一種「永恆無疆」的境界；而官僚政體理論，只能企圖分析列寧體制的政治派系、權力鬥爭和利益團體，而不具有解釋政權變遷 (regime change) 能力。<sup>7</sup>另為目前所流行而可回溯至柯西 (Ronald Coase) 之新制度主義途徑 (new institutional approach)，允許以其自身特定之脈絡，提出不同文化間之推論機制，嘗試發掘政經現象之根本原因，<sup>8</sup>但對個人主體能動性之作用，卻有不同認知。若欲批判此等分析架構，則應先探究採取何種分析架構最為適當。換言之，如何能跳脫長久來，西方的行為科學或以西學為中心研究取向之不當「套用」或「硬嵌」，回歸從馬列理論脈絡 (context) 以及中共內在政、經機制去掌握中國大陸總體社會變遷之發展。<sup>9</sup>

若從國際互動之現實角度以觀，儘管「全球化」步伐<sup>10</sup>促使各國

7. 袁易，〈傳禮門－柯林頓政府的中國問題智囊〉，《美國月刊》，第9卷，第3期，1994年3月，頁128；請見 Philip G. Roeder, *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xi.

8. Chin-Yu Shih, "Reconsidering the New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China: English Writings by Chinese Scholars,"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15, No.2, 1999, pp.126-145; Ronald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16, 1937, pp.386-405; 另請見 Edwin A. Winckler ed., *Transition Form Communism in China-Institution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9);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9. 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年），頁1。

10. Sanjib Baruah, "Globalization-Facing the Inevitable?" *World Policy Jour-*

加速資本主義化過程，且「中國威脅論」之呼聲從未間斷，<sup>11</sup>但何以中共一方面仍能與西方工業國家周旋，牟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建設成果；另一方面卻又能對內堅持其「四個堅持」，對外在世界舞台上更形活躍，去年中共在「世貿組織」（WTO）會議上之發言，亦隱然有發展中國家龍頭之態勢，且包括西方七大工業國在內之各國競相與其交往。另由葉爾辛所欽定且當選為俄羅斯新總統之普丁，在就職演說中宣佈在憲法範圍內，更動聯邦總統與各地區行政長官的關係，並改變上議院的組成原則，以強化俄國的「縱向」權力機制。<sup>12</sup>這些變化是否意味長期以來西方學者先透過知識積累，用以解釋及預測之相關概念、模型等方法論上之「預設」，均應加以檢討。又江澤民在十五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學習理論要同瞭解歷史實踐，總結歷史經驗結合來」，<sup>13</sup>似隱含回歸中國之省思。

作者亟盼研究大陸問題之學者，能群策群力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中心主義之研究途徑。筆者認同進入 21 世紀，欲正確處理中國大陸問題，不僅需涵蓋縱向之歷史問題分析，亦應涉及橫向之結構面，包含了組成社會結構之政治、經濟、意識型態等諸多層面互動關係之探討。<sup>14</sup>

因此，筆者試圖嘗試藉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多重規定

*nal*, Vol.XV, No.4, 1999/2000, pp.105-112.

11. Peter Hays Gries, "A China Threat? Power and Passion in Face Nationalism," *World Affairs*, Vol.162, No.2, 1999, pp.63-75.

12. 〈普丁宣布強化中央集權震驚全俄〉，《中國時報》，2000年5月18日，版 13。

13.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頁 1。轉引自中共中央黨校編寫組，《鄧小平理論基本問題》（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 年），頁 1。

14. 鄒讜，〈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新路向—綜合宏觀歷史與微觀分析的一個理論框架〉，《社會科學學報》，第 3 期，1994 年，頁 108。

論」(overdeterminism)之歷史結構(historical structural)範疇，作為方法論。並輔之以比較法，<sup>15</sup>分析中國大陸動態情勢之發展。<sup>16</sup>筆者之所以選用阿爾杜塞的理論，主要有理由三個。第一，他自稱為馬克斯主義者，且一直為法國共產黨員。在學術上，不僅欲努力調和蘇聯正統馬克斯主義(orthodox marxism)和西方黑格爾化的馬克斯主義(hegelianised marxism)之論點，<sup>17</sup>並以無比勇氣捍衛列寧主義原則。因此，思考相同奠基於馬列主義之中國大陸社會的變革與發展，應較能掌握問題之本質；第二，阿爾杜塞認為，應以一種個案研究法(case-study method)去分析現有歷史場合(given historical concept)，<sup>18</sup>且就整體社會主義發展言，中國大陸之社會主義變革，就是必須解釋之個案；第三，他的「多重規定論」實際上就是強調應以一種整體性觀點<sup>19</sup>去看待問題，而非單一因果(unicausal explanation)的說明，且亦涉及對辯證法的不同詮釋和運用，此均符合中共對物質世界的結構性、過程性、與規律性之認識要求。

15. 林碧炤，〈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與中國大陸研究：一項比較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34卷，第9期，1991年9月，頁10；淦克超編，《政治研究與科學方法》（臺北：幼獅書店，1973年），頁115、122、173-183；另「對比法」對「比較法」之輔助請見沈清松，《現代哲學論衡》（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頁1-38。

16. 此種多重規定之歷史結構研究法是以個案分析為基本取向，重視的是其結構因果關係之探討，及針對此重大歷史現象解釋其顯著意義。除了企圖去理解此特殊歷史個案特定性以彰顯個體獨特性外，並嘗試是否有可能建立部分通則化，而能用於其它類似例子的動態發展。

17. Gibson Burrell and Gareth Morgan, *Sociological Paradigm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82), p.346.

18. 同註17，頁345。

## 貳、「多重規定論」之緣起

### 一、反省基於經驗主義知識論之人文主義的馬克斯主義

論證歷史的真實性不能從它的明示論述中去解讀，因為歷史的文本是聽不見和不可讀的，而對諸結構的結構作用的一種註解。<sup>20</sup>因此對於馬克斯最重要的理論性著作《資本論》而言，若要能夠正確解讀，就必須先要瞭解它與其對象的關係問題，即它的對象的特殊問題及它與其對象關係的特殊性問題。且應以「辯證唯物論」的問題意識角度解讀，才能夠正確詢問一個特殊論述的特殊對象，和這個論述及和它的對象之間的特殊關係。

### 二、闡明知識對象是理論實踐所產生之概念

我們處理的是已經合成的原料，是獨特結合感官、技術、和意識型態要素，而組合在一起的直覺或表象的結構，因此知識是在獨特原料而非現實對象上工作。又現實次序和邏輯次序是矛盾的，這兩個次序是翻轉的關係，不能僅以概念視之。它的意義亦不能僅以表明的事實來掌握，而應從明確理論領域的事實來掌握。<sup>21</sup>因此只有藉由理論實踐運作下產生的概念，才是知識的對象。

---

19.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389.

20. 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17.

21.同註20，頁48。

### 三、論證馬克斯主義之科學性

以往視理性的歷史是連續發展的直線歷史的看法是不對的。歷史關係是生產關係而不是表現關係，而要掌握這個範疇時，須在一種特殊理論關節中，去區別知識生產的條件的邏輯，究係屬於科學抑或是屬於意識型態範疇。<sup>22</sup>且惟有透過從文本出發的「症候解讀法」，才能把文本中所遺漏問題明白表示出來，而達到其理論性特有風格，<sup>23</sup>也惟有透過此種解讀方式，才能論證出馬克斯主義的科學性。因此，在閱讀馬克斯著作時，不僅要注意到馬克斯已寫出來的部分，也應該看到隱藏在文本中沒有完全表達出來的部分。

### 四、源於「歷史唯物論」之多重規定論

經由對馬克斯早期和晚期作品的對症解讀，發現科學的馬克斯<sup>24</sup>在歷史唯物論中，欲以一種新的體系方式，去詢問世界問題和新原則及新方法問題。即馬克斯以經濟、政治、意識型態等特殊差異的具體概念，取代「意識型態」和費爾巴哈「實踐」的普遍性概念，而盼充分掌握在社會結構中，每一個特殊實踐的差異性。因此，在「辯證唯物論」的重新詮釋，及藉由對「歷史唯物論」深化下，歷史唯物論不再是「經濟決定論」或是「技術決定論」，而是應以「多重規定」的辯證法觀點去加以看待。<sup>25</sup>

---

22.同註 20，頁 45。

23.同註 20，頁 44-50。

24.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pp.223-226; 另請見沈清松，〈阿爾杜塞的政治哲學與馬克斯主義的評估〉，《哲學雜誌》，第 2 期，1992 年 9 月，頁 19；關於問題意識的討論請見陳璋津，〈國家理論－問題設定和理論〉，《東亞季刊》，第 23 卷，第 3 期，1992 年 1 月 1 日，頁 11-12。

25.所以「多重規定論」是由歷史唯物論而來，在運用上並賦予辯證唯物論主角地位。



## 參、「多重規定論」之內涵

馬克斯所謂「必須把黑格爾倒立之辯證法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祕外殼中的合理內核」。馬克斯的顛倒意義包含兩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對象變化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辯證法本身性質轉變的問題。所以，黑格爾辯證法的基本結構，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對立面的同一、揚棄、質轉化為量、矛盾等，對馬克斯言就有一種不同於原來在黑格爾那樣的結構。而阿爾杜塞的多重規定論，就從如何正確理解馬克斯對黑格爾辯證法顛倒，去逐步開展出來，並從整個辯證法結構的轉變角度，去重新思考和詮釋。且其內涵涉及了互相糾纏、且又有其各自衍生重點的總體性、歷史觀、結構因果性、和社會實踐等方面的問題。

### 一、總體性與矛盾的多重規定

以非規範性角度來看待總體性，反對將社會或文化整體化約到它的組成部分，而強調此整體的關係結構的不可化約性。<sup>26</sup>並思考定義一種結構因果性概念是如何可能？<sup>27</sup>並從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sup>28</sup>借用了多重規定論的概念，提出了結構因果性的看法。指出結構就是多重規定和最終決定的機制，本質只有通過建立表現其要素之間關係的科學概念才能掌握。故在此結構機制的作用下，結構的複雜性，是通過各種要素的相互區別及依存關係來加以表現。且不可能以同樣的歷史時間，去思考整體不同層面的發展過程。這些不同層面的每一個，並沒有同樣的歷史存在類型。而這些歷史中的每一個的特殊性，是建立結合在整體的一定類型上，因此是建立在對整體依賴之一定類型上。<sup>29</sup>對

---

26.同註19，頁389。

27.同註19，頁186。

28. Sigmund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rans., A. A. Brill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0), pp.174-200.

29.同註20，頁89-100。



總體言，各層次彼此是相互的存在條件，然亦有一定次序，即經濟把宰制地位的層次移置給一個特殊層次，並分派給其它層次獨特的角色。<sup>30</sup>

## 二、歷史觀與矛盾的多重規定

為了避免使馬克斯矛盾的多元特徵範疇陷於混亂狀態，則必須要證明其矛盾的特殊結構，不是對黑格爾歷史概念單純和簡單的顛倒。而此涉及市民社會、國家、基礎、上層建築等在歷史發展階段之不同認知。是對現實世界的「解剖」，和這解剖變化的辯證法。因此，市民社會概念被某種確定社會形態的生產模式取代，而生產力發展程度及生產關係狀態，即為可操作概念。另外，國家也不再是理念的實體，而是統治階級和為剝削階級服務的鎮壓工具。因此，馬克斯給我們提供了一條鏈條的兩端：一端是藉由生產的（經濟）模式的最終決定作用；另一端是上層結構的相對自主性和他們特殊作用。此很清楚的和黑格爾藉由意識本身（意識型態）的說明根源斷裂；也和黑格爾現象-本質-什麼的真理命題斷裂。

## 三、矛盾的多重性與占主導地位的結構

多重規定論的概念，就是複雜性－結構性－不平衡性－決定性。若以列寧「薄弱環節」理論，去說明 1917 年蘇聯社會激烈變革與革命發生之所以可能，主因就是蘇聯當時係處於帝國主義最薄弱之點，加上內部所有歷史矛盾的累積和惡化的獨特情節而造成。由於矛盾是在不平衡規律下支配，因此，在矛盾和矛盾各個方面間，必須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惟只有經換位產生的主要矛盾變成決定性的，即藉由凝聚或融合爆發構成了薄弱環節，而能夠加以掌握和實行政治實踐

---

30. Alex Callinicos, *Althusser's Marxism* (London: Pluto Press Limited, 1976), p.42.

（或理論實踐），就產生了對現存統一體的消解作用，但此亦必須注意到矛盾的動力作用。因此矛盾就是所有發展的動力，不平衡規律就是矛盾的換位、凝聚、變化的先決條件。此不平衡性是必然而非偶然的，反映出各個不同層次的相對獨立性及宰制－從屬關係。所以要去分析結構根本的結合（essential articulations），內在的前後關係（inter-connexions），任何革命實踐可能和命運依賴的戰略中心點，及決定性國家中矛盾的性質和關係。<sup>31</sup>

#### 四、社會形態與社會實踐

每一個社會形態均構成一個有機整體，由經濟、政治和意識型態三個必要的層次組成。「實踐」係意味任何透過一定人類勞動，使用一定的（生產）手段，把一定的原料轉變為一定產品的過程。在任何這類實踐中，決定性時刻（或要素）既不是原料，也不是產品，而是狹義的實踐，是人、手段、使用這手段的技術方法，在一個特殊結構中工作，轉變它自身勞動的時刻。<sup>32</sup>因此「社會實踐」係存在一定社會裏頭各種實踐的具體複雜統一體，是由經濟實踐、政治實踐、意識型態實踐和理論實踐，在某一個特定發展空間和階段上所組成。<sup>33</sup>而每一種社會型態為了存在，必須在它生產的同時再生產它的生產條件，即必須再生產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且賦予理論實踐的特殊作用。並在分析理論實踐的過程，建立了三個概括說（Generality）。<sup>34</sup>

---

31.同註 24，頁 178-179。

32.同註 24，頁 166-167。

33. Louis Althusser, Gregory Elliott. ed., trans. Ben Brewster, James H. Kavanagh, Thomas E. Lewis, Grahame Lock and Warren Montag, *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 &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90), p.24.

34.第一個概括是理論實踐的原料，是由先前實踐的產物之抽象概念所組成。第二個概括是生產手段，也是問題意識。第三個概括就是科學理論，就是知

藉由此三個概括說，可將黑格爾理論看成意識型態，而放入第一概括；再將馬克斯科學理論放入第三概括。因為第一概括和第三概括的不同是一種斷裂關係，對意識型態和科學理論作出了區隔，也區別了馬克斯和黑格爾之不同，<sup>35</sup>進而凸顯了馬克斯主義的科學性。《解讀資本論》中，即是針對前述設計，將馬克斯之《資本論》加以剖析。

以馬克斯和黑格爾的關係（G'1）作為原料，用理論生產的工具G'2（馬克斯本人＋某些其他的範疇）來對這種原料進行「加工」，以產生結果G'3即《解讀資本論》。而《解讀資本論》此一理論勞動是暫時的，必須在一個新循環中繼續下去。則G'2可以通過過馬克斯和《解讀資本論》之間的正確與錯誤等關係來加以展現。而欲此內部循環持續向前推展，尚須透過階級鬥爭的經驗<sup>36</sup>來實現。

由於理論型態統治了意識型態鬥爭，且能夠開展馬克斯主義理論對共產黨全部實踐的影響，因此，理論實踐是共產主義組織根本且永久的工作。所以思考作為一個有機社會形態一部份的意識型態實踐時，就不可以忽略馬克斯主義科學理論的歷史唯物論和哲學理論的辯證唯物論，凡此均涉及了如何以「多重規定論」，去看待社會形態及其實踐和發展問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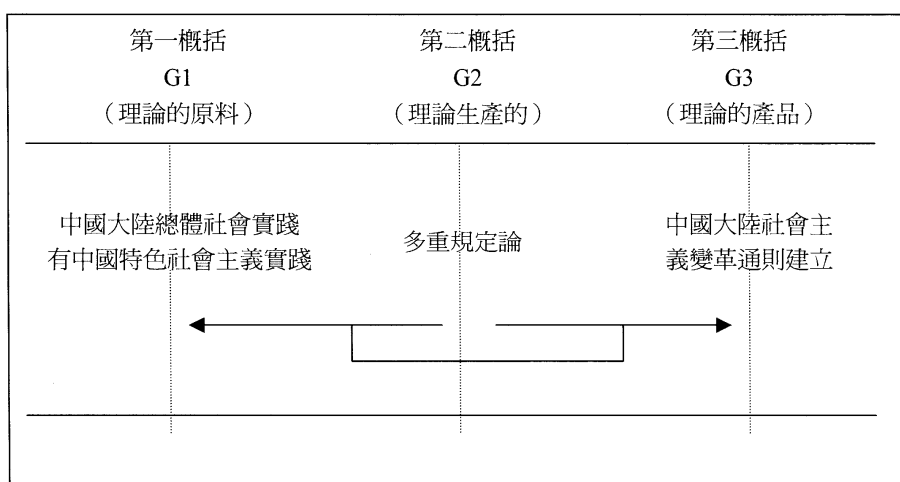
識，並決定什麼樣的問題才是科學層次問題。理論實踐就是在第一概括中藉由第二概括的加工而產生第三概括。

35. 閻嘯平，《馬克斯理論的詮釋－阿弘和阿圖塞的對話》（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頁143。

36. 阿圖塞著，杜章智譯，《列寧和哲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頁113-115。

## 肆、「多重規定論」之運用

欲由「多重規定論」結合「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思維，探究中國大陸社會主義之變革，可由理論實踐之三個概括架構如下：



在前述圖表中，為操作方便，即可暫以化約方式把中國大陸總體社會實踐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作為探究中共社會主義變革之理論原料，而以多重規定論和某些其他範疇，如馬列主義、鄧小平思想、「三個代表」等，作為理論生產工具。俾對理論原料進行加工，以產生理論產品。亦即對中共社會主義變革之理論實踐加工，而可能建立具有解釋力之部分通則。<sup>37</sup>

為把握多重規定論所彰顯出事件之複雜性、結構性、不平衡性、及決定性之特質，而有利於方法論上對事件之分析運用，可以布勒

37.同註17，頁345；郭良文，〈多元比較方法論的觀點與檢討－以臺灣社會經濟不平等為例〉，《思與言》，第31卷，第2期，1993年6月，頁1；葉啟政，《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臺北：三民書局，2000年），頁189。

(Gibson Burrell) 和摩根 (Gareth Morgan) 在《社會學典範和組織分析》(Sociological Paradigm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一書中之相關概念之說明作為參考點。而能萃取出據以分析之變數。彼等將阿爾杜塞的學說歸類於「激進主義之典範」(the paradigm of radical structuralist)。認為該典範主要目標，是提出對社會事務 (social affairs) 現狀之批判，且將焦點置於社會的結構，特別是結構之間相互關連 (interrelate) 之方式。<sup>38</sup> 視社會包含了相互處於矛盾的要素，並注重這些矛盾的作用 (effects)，特別是這些矛盾所形成的政、經危機。因為這些危機會引起結構的變遷，從而導致現狀的瓦解，甚至被另一種更激進的社會形式所取代。因此，可萃取出四個中心概念 (notions)，分別是總體性 (totality)、結構 (structure)、矛盾 (contradiction) 和危機 (crisis)。<sup>39</sup> 因此，可以此四個概念作為「多重規定論」用以分析事件發展的參考點，而彰顯及掌握事件根本上之複雜性、結構性、不平衡性、及決定性。

### 一、總體性

歷史是構成其不同層次的關係之發展過程的結果。因此對於作為歷史主體的人類社會，只能在一個總體脈絡中 (within a total context) 以他們所存在和反映的更廣社會形態 (formation) 中去瞭解。而此人類的社會總體是由政治、經濟、意識型態三部份構成的統一體。則社會實踐<sup>40</sup> 就是此複雜性總體的經濟實踐，政治實踐，及意識型態實踐在一個確定的空間和發展階段上所組成的。若以所謂馬克斯科學理論

38. 同註 17，頁 326。另請見顏良恭，〈典範不可共量概念與組織理論研究：圍繞 Burrell 與 Morgan 觀點爭辯之評析〉，《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68 期，1994 年 3 月，頁 157-158。

39. 同註 17，頁 358。

40. Ian Craib, *Modern Social Theory – From Parson to Habermas*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Ltd., 1994), pp.129-130.

和勞動階級運動結合的角度，去掌握勞動階級運動的實踐，可以發現此實踐是擴展在具有交互作用之三個平面，而和構成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型態三個層次一致。即是採取經濟、政治、意識型態三重鬥爭形式。而此三個鬥爭形式，雖有區別但又融合在一個統一體之中。<sup>43</sup>

→運用：中國大陸是一個總體性社會。係由政治、經濟、意識型態三個相互依存適應的層次組成。經由此三個組合層次之不斷實踐作用，而產生維繫、供應其存在及發展之生產條件，並彰顯出其不同於其它社會之特性。因此，對於中國大陸社會重大歷史事件之分析，不能僅針對其局部的經濟、政治、或意識型態層次單獨去進行，而須將之視為中國大陸總體性社會相互依存的組成部分之互動結果，來加以研究。

## 二、結構

社會總體就是一個結構統一體。結構不是存在於可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而可直接加以觀察的實在。它是相對持續和永久性的，屬於不同層次的一種實在。它的作用構成了社會總體的基本邏輯。透過此邏輯之運作，社會總體的外顯秩序才可以明確掌握。所以，不能個別隔離的分析諸社會關係，而必須思考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且分析每個體系（層次）時，彼此內在邏輯的分析，應優先於起源及演化過程分析。<sup>41</sup>而在此結構機制作用下，結構可以經由其構成之諸要素間，相互區別又依存之關係，來表現出其複雜性。因此，社會作為一個統一的總體，其各個層面具有獨特性。因為移置支配了每一個要素的因果性，因此事件的發生不能歸為是任何的個別原因。而把原因由一種事物、一種獨特可個別指認出來的實體的看法，轉變為一種關

---

41. Tom Bottomore ed., *Interpretations of Marx* (New York: Basil Blackwill, 1988), p.72.

係。把立即可以或最終指出掌握東西，轉變視為由總體結構對其各元素產生作用的移置。

→運用：中國大陸作為一個總體性社會而存在，就展現為一個複雜的結構統一體。此結構指的是構成中國大陸總體性社會之政治、經濟和意識型態三個不同實踐層次之間的互動關係。且此關係把三個實踐層次組成一個總體，並構成了中國大陸社會運作的基本邏輯。而透過對此邏輯運作之掌握，就可以充分瞭解中共社會的外顯秩序。因此，進行研究時，必須先確定此三個實踐層次各自的基本內涵，接著要分析彼等互動關係，即如何相互作用、調節而維持穩定發展，又在環境變遷下如何不相適應而無法契合，致造成結構崩解。也就是分析彼等對維繫中共總體社會存在及發展之生產條件，以掌握其結構因果性，從而在結構上把握中國大陸總體社會實踐。

### 三、危機

視社會變遷為一種涉及極端形式的結構換位過程。是經由矛盾概念來解釋，認為在現有之總體中，當矛盾在經濟或政治等層次達到某一點（point）之後，就會產生危機。如政治危機或意識型態危機。其中一組結構可能會被另一種不同類型結構所取代，最終會導致總體危機，爆發革命而導致社會變遷。

→運用：從結構因果觀點言，雖然中國大陸社會總體結構是由經濟實踐層次來最終決定的，即物質條件生產可決定社會生活其它不同的政治、意識型態實踐層次之主導地位角色，而可作為整體社會發展所需之生產架構及支持，然政治、意識型態實踐亦有作用。因此，不再是經濟個別原因，而是總體結構對各實踐層次作用之關係結果。故對中國大陸社會變遷之研究，是著重於組成該社會三層次之實踐不相適應而導致之總體性危機。所要分析的重點，就是探討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意識型態危機之間的緊張衝突，所導致之總體性危機如何造成中國大陸社會總體結構之轉變。



#### 四、矛盾

是和整個社會總體結構、存在形式條件，制約情況不可分割的。矛盾是所有發展的動力，對立場所（locus），是依據占主導地位結構的矛盾關係而可能變化。在不同情況下，會有矛盾之間角色交換的代替換位現象，及對立面同一的融合凝聚現象產生。如在社會穩定時期，矛盾藉由換位而抵銷作用，但在革命情境下，則可能藉由凝聚或融合，而產生革命性決裂。又如以政治實踐在一個發展過程的不同時刻，會有三種區別：第一，是非對立，在歷史或理論中的量變，矛盾是以換位形式主導；第二，是對立，在社會中尖銳的階級鬥爭，在科學中理論危機，矛盾是以凝聚形式主導；第三，是爆發，在社會或理論領域中的革命，會導致整體崩潰，而在質的新基礎之上整體性的全面重構。因此，革命的可能性，就取決於構成社會形態不平衡關係所造成的特殊條件。

→運用：要探討引起中國大陸總體社會結構轉變之總體性危機，首要研究的就是在中國大陸社會型態中，矛盾之類型和擴展。矛盾可能來自外在之國際和不同區域之動變情勢，也可能來自內在的經濟、政治、意識型態實踐中。當矛盾已擴展至總體結構無法忍受，即總體結構無法正常運作時，就會產生危機，而爆發革命。且依據占主導地位結構的矛盾關係來看，矛盾之對立鬥爭場合，不一定是發生在經濟實踐層次，也可能是在政治或意識型態實踐層次。而在不平衡規律支配下，矛盾會有不同類型出現。因此，要分析中共社會穩定時期，矛盾如何藉由換位而互相抑制、抵銷作用，使矛盾沉滯，而中共社會實踐得以正常運作。又矛盾何以會凝聚或融合，而互相加強，產生與現存結構對立之革命性決裂，致爆發革命，使中共社會型態有重構之可能。

## 五、多重規定論運用之初步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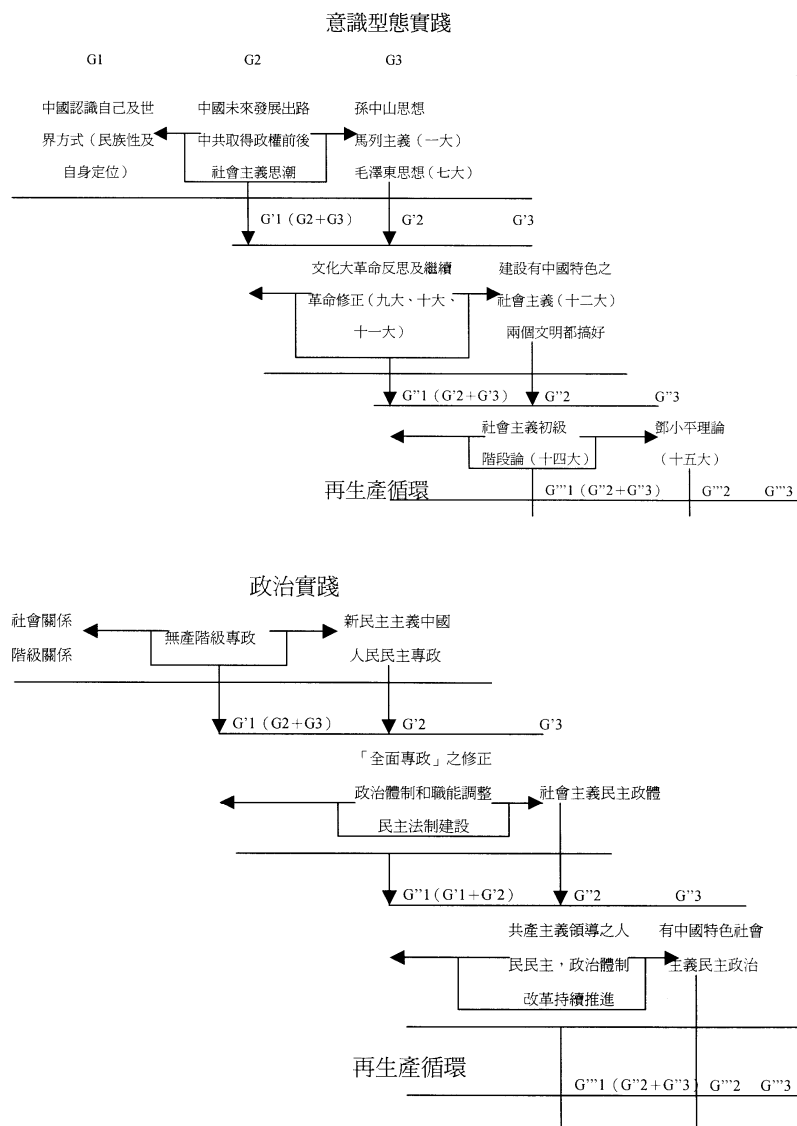
藉由經濟、政治、和意識型態實踐，所展現出中國大陸總體性社會之存在為分析背景脈絡，以三層次結構間之互動關係為分析框架，且抽離出矛盾與危機為分析變數，並以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之發展戰略檢討為例，而可嘗試初步之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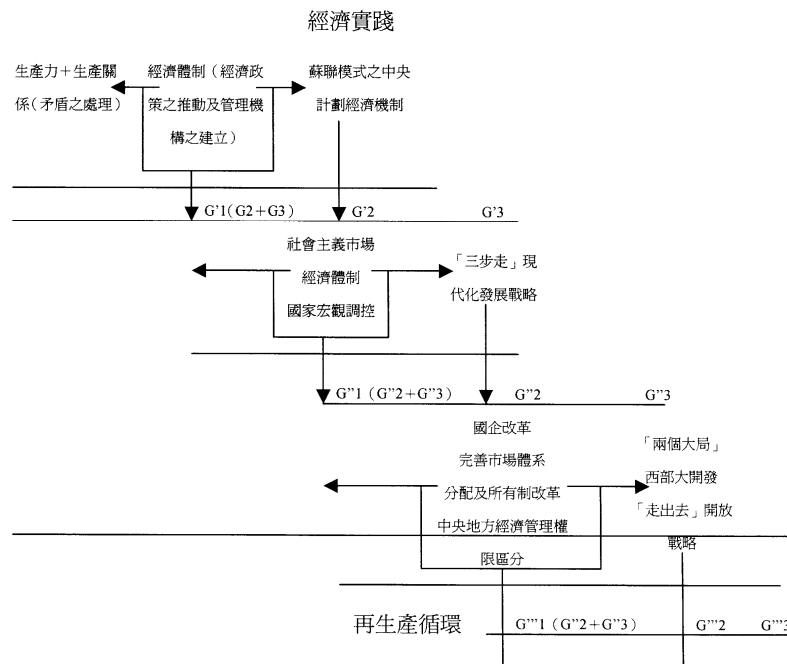
在實踐過程之三階段中，前題是中共為了使中國大陸免於進入矛盾「爆發」階段致產生危機，而得以由「對立」之可能，回歸到「非對立」之常態穩定階段，則勢必以換位作為矛盾之主導形式，以抵銷可能之革命性決裂。故首要解決之主要矛盾是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需要；並要釐清兩種生產關係，<sup>42</sup>及確保對於取決於兩因素之階級鬥爭的勝利，而能確實掌控複雜之矛盾全局。因此，在意識型態實踐上、政治實踐上、及經濟實踐上各有其據以加工之不同原料，及克服矛盾之產品產生。如意識型態實踐層次上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鄧小平理論；政治實踐層次上之社會主義民主政體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及經濟實踐層次上之「三步走」現代化發展戰略到「兩個大局」、西部大開發及「走出去」之開放戰略等，請見下列圖表。

而雖然在三個實踐層次相互調節運作過程中，矛盾藉由換位而互相抑制、抵銷、沈滯，致能維持中共總體社會之穩定發展。但為了維持生存再生產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時，各實踐層次之矛盾可能又將逐漸浮現，而展現出再生產循環之特色，並涵泳通則建立之可能。

---

42.同註 13，頁 82。





## 伍、結論

嘗試藉由知識論之角度，去辯證看待中國大陸問題之深層意涵及其發展；且回歸從馬列理論脈絡，及考慮中國固有場景之歷史中，透過中共內在機制，去掌握中共總體社會變革；進而尋求走出一條屬於中國人自己研究大陸問題道路之可能，不僅是本研究目前且是爾後需長期努力之方向。而對本文「多重規定論」之運用，雖已概論其內涵、運用原則及可能之操作，但畢竟仍是初步，尚須更細緻化。且若從方法論上去思考，亦發現一些在運用上可能產生的限制，致須不斷的檢討加以克服：

第一、任何總體社會的動態發展均是相當複雜，而對此種動態發展之研究概屬於巨觀社會學（macro-sociological）領域，故在實際操作上可能（operational）無法鉅細靡遺的訴諸於所有社會關係和社會

生活的具體內容，因此所謂透過適當的「可能性判斷」(judgement of possibility)，藉由對歷史現象抽取過程，以找出結構因果關可能難免會有過度簡化情形發生。

第二、藉由理論推演及實際經驗之結合，透過三個實踐層次可能之組合及互動關係，以揭示中國大陸總體社會未來可能之發展。然所謂應按照「一般經驗規則」(general empirical rules)及「發展趨勢」(development tendency)之過程，在實踐上實亦無有客觀標準可資遵循；又此基本上是理念類型(ideal type)之運用，是一種「想像性建構」(imaginative constructs)，在現實上雖不可能完全吻合，然藉由此步驟仍應會對中國大陸總體社會未來可能之發展有其說明及啟發，當然也應儘可能避可能之「過份概推化」(over-generalization)的缺點。

第三、欲進行比較研究，就邏輯實證論之作法理應把理論儘量化約(reduction)為數個乃至單個假設(命題)，或概念等較小單位，以充分掌握分析層次，落實比較研究。而溶有詮釋學之對比法，亦有體現在各組成概念彼此的關係或命題的各構成語詞關係上的結構(structural)對比，和表現在次級理論(命題)及其高級理論(命題)之間，或數個同級理論之交互影響上的動態對比(dynamic contrast)。然在實際進行比較時，常會遭遇先天之重大困難。因為若未受嚴格的學術訓練，則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常不易將其概念或假設表述清楚；或因政治考量而故意含糊，而為各方留下解讀空間。故欲將毛澤東到江澤民等中共領導者落實於社會實踐上之理念萃取出來，實不容易。故純就邏輯實證方法論上之要求去做，常無法化約至具體程度而發生困難。然亦須盡力就彼等於社會實踐過程中整理出共同的「硬核」(hard core)，而據以為比較屬性，並儘量就彼等相關文本(text)中理解其精義，而盼能從陳述(statements)中看出彼所認知之假設、概念而進行比較。此亦所以須輔之對比方法，盼能藉由思辨(speculative)上的認知，而能掌握解釋或範疇全體存在之假設。

（收件：2000 年 12 月 4 日，修正：2001 年 1 月 17 日，採用：2001 年 1 月 18 日）

## **A New Approach to China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Overdeterminism**

**Yuh-woei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Security,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Mainland China and to study its relevant subject matters one ought to form the macroview of how to treat and interpret history, and the methodology used to perceive the world. In other words, one should return to essence of depth of events, consider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and history occupation, rather than superficially adaptation on Western models without test by self-evidence. In terms of epistemology, this paper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socialism of overdeterminism, hope to find different approach from "capitalism"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through the expression of its limited scope in order to adjust its application operational.

**Keywords:** Paradigm, Overdeterminism, Text, Symptomatic, Totality